

西柏坡

精神论要

张振国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XIBAIPO JINGSHEN LUNYAO

西 柏 坡 精 神 论 要

张振国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柏坡精神论要/ 张振国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02-11180-2

I. ①西…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作风-研究 IV. ①D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3163 号

西柏坡精神论要

作 者	张振国
责任编辑	项一莎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02-11180-2/D·76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西柏坡精神的思想渊源和形成条件

第一节	西柏坡精神的诠释	1
	一、观察西柏坡精神的不同视角	1
	二、对西柏坡精神的新诠释	3
	三、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	5
第二节	西柏坡精神的思想渊源	8
	一、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8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10
	三、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11
第三节	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13
	一、两种命运的决战使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3
	二、波澜壮阔的历史是西柏坡精神产生的基础	18
	三、伟大的使命铸就西柏坡精神不竭的生命力	20
	四、西柏坡时期面临着三大历史使命	27
第四节	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标志与基本特征	29
	一、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标志	29
	二、西柏坡精神的基本特征	31

第二章 西柏坡精神的内核

第一节	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艰苦奋斗、谦虚谨慎	38
	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	38
	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容	43
	三、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47
第二节	西柏坡精神的宗旨：以民为本、立党为公	54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	55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西柏坡精神的坚强基石	60
三、光大西柏坡精神,打牢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根基	68
第三节 西柏坡精神的本质:与时俱进、科学创新	74
一、与时俱进、善于创新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	74
二、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是西柏坡精神的显著特征	80
三、弘扬西柏坡精神,加强党的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	87
第四节 西柏坡精神的灵魂:依靠群众、团结一致	95
一、土改、整党运动的结晶	96
二、加强纪律与发展民主的统一	98
三、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支柱	100

第三章 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

第一节 西柏坡精神的科学体系与历史地位	105
一、西柏坡精神的体系构架	105
二、西柏坡精神的逻辑结构	107
三、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地位	110
第二节 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111
一、西柏坡精神是执政兴国的正确指针	111
二、西柏坡精神是执政党建设的精神源泉	112
三、西柏坡精神是加强共产党员教育的思想武器	114
第三节 西柏坡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116
一、“三个有利于”思想中西柏坡精神的蕴涵	116
二、“三个代表”思想中西柏坡精神的蕴涵	121
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中西柏坡精神的蕴涵	125

第一章 西柏坡精神的思想渊源和形成条件

第一节 西柏坡精神的诠释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铸就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包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西柏坡精神产生和形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组织、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同时,将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并准备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我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即历史转折之魂。只有抓住革命转折这一时代特征及其历史主题与相关课题,才能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从而把西柏坡精神研究引向深入。

一、观察西柏坡精神的不同视角

西柏坡精神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1987年,苏斯民在《四川党建》杂志上发表《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一文,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一种可贵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是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结晶,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其可贵和重要”。但此文当时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时隔四年,在199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河北日报》于7月17日以《继承和发扬“西柏坡精神”》为题予以重发,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自此,学术界围绕西柏坡精神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

论,出版了一些研究资料和著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论点。但总的看,西柏坡精神研究还是初起阶段,代表性论文很少,还没有代表性专著,西柏坡精神还远未在全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和应有地位。

西柏坡精神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给它以科学的概念?西柏坡精神的内涵究竟有哪些?如何给它以科学的界定?这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议最多的问题。根据我们手头的材料,大体有下面五种观点:

一是把它作为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来研究。1991年,王居英连续发表《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①《试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及历史作用》^②等文,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一种革命历史精神”,指出:“应根据当时历史的基本事实来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而不能根据今天的需要任意解释”,“也不应与其他历史精神表述相互雷同”。由此出发,他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包括四点:敢于和善于决战、敢于和善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一往无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艰苦创业,讲究工作效率的奋力拼搏精神;注重团结、加强纪律性的团结统一精神。他还认为西柏坡精神“独特的风格”,在于它的历史连续性、创新性和革命性。由于学术界当时尚未着力考察那段革命历史,因而,未能真正从西柏坡精神的特殊本质上阐明它的科学含义。

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彻底革命精神来研究。1994

①王居英:《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党史博采》1991年第5期。

②王居英:《试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及历史作用》,《党史博采》1991年第12期。

年,戴广田发表《论西柏坡精神》^①一文,薛建中发表《历史周期律与西柏坡精神》^②一文,他们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解决中国革命转变问题所体现的彻底革命精神。戴广田指出,“必须弄清那个时代的主题”,才能从本质上掌握西柏坡精神。薛建中认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核心内容是“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他们都提出历史转变和时代主题,这颇有新意,实际上几乎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但是,由于缺乏对那时的“彻底革命”口号做具体的历史考察,还是未能对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做出确当表述。

三是把它作为党魂来研究。1995年,时运生、王彦坤发表《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③一文,提出:西柏坡精神主要包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而这一精神的主旨(主题)是“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认为,“两个务必”鞭策共产党人面向未来,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不仅应当成为共产党人永远保持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远拥有的党魂,而且应当成为世代相传的民族之魂。由于该文意在论证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实际是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概括西柏坡精神,因而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四是把它作为一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精神来研究。1996年,石仲泉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④一文,指出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不能局限于此。他认为,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他说:“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会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石仲泉的分析十分精辟,开拓了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新视野。但由于是“兼谈”,并没有从总体上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

五是把它作为一种善于改造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来研究。1998年4月,夏月娥主编的《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西柏坡精神的第一本著作。该书提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既善于破坏旧世界,又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升华。”并认为:“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精神,也是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它决定了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

①戴广田:《论西柏坡精神》,《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1期。

②薛建中:《历史周期率与西柏坡精神》,《河北日报》1994年1月5日。

③时运生等:《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8日。

④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斗的精神。但是,由于它把“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界定为“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或“大决战”时期,而对革命性质的转变关注不够,分析不够,因而,还是未能深刻地揭示出西柏坡精神产生时期的总的历史特征,真正从“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这一总的历史特征高度,来对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加以概括和归纳。

上述一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实际,揭示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有些提法,如“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应当依据历史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必须弄清历史主旋律”,“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转变的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两条伟大道路的转换处”等,是非常深刻的。因而,为比较全面地、系统地研究西柏坡精神,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是,由于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未能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考察,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的总的历史特征,紧紧抓住那段历史的主题,因而尚未能从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的全局上,来确当地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

二、对西柏坡精神的新诠释

什么是西柏坡精神?怎样才能给它以科学的概念?这个问题是西柏坡精神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关键性问题。确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刻地理解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的历史特征,紧紧抓住这段历史的主题和相关课题。除此之外,我觉得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有一些误区应当注意加以区分。如,把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与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混为一谈;或者以为从不同角度指出有关内涵,就等于阐明了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结果列举了若干条,还是弄不清楚西柏坡精神究是竟什么;或者以为指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或核心,就等于阐明了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结果以一概全,也不能真正阐明西柏坡精神的科学

概念。又如,把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与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混为一谈,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形成的一整套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都是西柏坡精神,结果搞得太杂,几乎变成无所不包了。再如,忽视西柏坡精神的特殊品格,有一些表述,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相互雷同。

实际上,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是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概括。内涵是它的本质属性,外延是它涵盖的范围。就是说,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也就是指它的内容是有限的,仅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只有在这一特定的时限内,基于革命实践所形成的体现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那些思想、心境、道德和风貌(革命传统和作风),才能铸成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而不是指这些思想、心境、道德和风貌(革命传统和作风)本身。西柏坡精神的科学概念,是对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的历史特征的科学抽象,应当涵盖西柏坡时期所形成的反映其时代要求的西柏坡精神诸项内涵,但并不是指西柏坡精神诸项(或一项)内涵本身。虽然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文化渊源,都可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党魂、军魂、民族魂,但是,它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要解决的历史主题不同,有关课题不同,凸显了它的特殊本质,在表述上亦应有其独特的风格。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时期。这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总的历史特征。所谓“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就是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准备进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个重大历史性转折。这里的关键,就是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第一,从乡村到

城市的转变。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长期占据农村,建设农村根据地。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1944年6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把准备夺取大城市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并指出:“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准备城市工作,不学习管理工商业,“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①。在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地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问题提到全党面前,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并进一步提出:“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②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阶段,国共两党的斗争主要就是争夺城市。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决战后,夺取了大批城市,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成为现实的紧迫问题。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以这次全会分界,总结过去,重心在农村,现在要转到城市,不转过来

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如果我们“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③。从乡村到城市这一重大转折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转变。1840年以来,中国的战争连绵不断,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到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被镇压下去。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和三大战役决战后,中国人民才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④。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转折的实现,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长达一百零九年的战争,结束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二十八年的革命战争,实现了已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建设。以这个重大转折为分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征程,过去工作重点是搞革命战争,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同时在根据地里改造着旧社会,创造着新中国;现在工作重点是搞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革命胜利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⑤。如果我们在生产建设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建设,不

①《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6-947页。

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333页。

③《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④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⑤《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能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那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就会失败。

第三,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折。前两个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毛泽东提出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讲了如何对资本主义既要利用,又要限制的问题。周恩来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发展新资本主义的观点。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决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这就进一步明确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如何实现这一重大转折的问题。

总之,夺取革命的全国胜利,实现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总的历史特征。革命精神来源于革命实践。因此,我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变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准备进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实践,所铸就的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即历史转折之魂,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个定义,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第一,它表明了西柏坡精神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第二,它反映了当时所解决的历史主题和相关课题;第三,它概括了西柏坡精神的特殊本质;第四,它表明了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其他革命精神的

内在联系和根本区别。因而,弥补了以往之不足。当然,它是否科学、确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

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基本内涵到底包括哪些?如何给以科学的界定?我认为,这是西柏坡精神研究中的又一个基本问题,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含义至关重要。为了科学地界定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和基本内涵,必须弄清楚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它的基本内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目前,学术界对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有人谓之“实质”或“核心”;有人谓之“灵魂”;有人谓之“主题”或“主旨”),其说各异:一说是“彻底革命精神”;一说是“团结求是精神”;一说是“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说是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些看法,各有其道理,但都有一个缺憾,就是没有紧紧把握住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而正是这段历史的主题决定着西柏坡精神的本质。

我认为,西柏坡精神的本质,就是指它的核心,所谓“灵魂”“主旨”“实质”等等,只是说法不同而已。西柏坡精神作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产物,要弄清楚它的本质,就必须从分析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入手。只有弄清楚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主旋律是什么,那段历史怎样提出问题,又怎样解决问题,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西柏坡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历程中,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主题,它决定着中国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精神的本质和方向。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处在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三大转折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即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①。这个历史主题,决定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方向,规定了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或核心。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主要标志。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重点是组织战略决战、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国际形势、战略方针、加强纪律、党内民主、财经统一等八个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他批评了发展新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以便“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和方法。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

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使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毛泽东通过具体分析国情,指出中国经济基础薄弱,现代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分散落后的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夺取政权后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还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④这些论述表明:通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所选择的中国的建设道路。因此,我认为:在西柏坡,为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所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理论思考和一系列重大决策,体现了一种继新民主主义之往,开社会主义之来,“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⑤。为

①薛建中:《历史周期律与西柏坡精神》,《河北日报》1994年1月5日。

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6页。

③《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1427页、第1437页。

④《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1433页。

⑤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简明起见,可以把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或核心,概括为“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集中体现。

既然西柏坡精神的本质是由那段历史的主题所决定的,那么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就是由围绕那段历史主题的重要课题所决定的。只要弄清楚围绕历史主题的有关重要课题是什么,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就迎刃而解了。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历史主题,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准备进而向社会主义转变,即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纵观那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围绕解决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所面对的历史性课题,即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是艰巨而严峻的,大致有如下四项:第一,是否敢于和善于不失时机地举行战略决战,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第二,是否能够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力量,统一政策,加强纪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三,是否能够制定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路线和政策,善于建设一个新中国;第四,是否能够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保持革命本色,这是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政治保证。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是在领导中国人民紧紧把握历史转折的主题,完成四项历史性课题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铸就了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涵。这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当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还占优势,还有美国的支持。中共中央对困难

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计,敢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敢于同敌人决战,当机立断,抓住有利时机,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年底、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际上也有人主张“划江而治”。在此风云变幻的关头,毛泽东以敢于全胜的精神,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举行战略决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宏伟实践中所形成的,这是一种敢于和善于抓住机遇,顶住压力、挑战,争取完全、彻底胜利的革命进取精神。

二是“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特别强调加强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加强纪律性与发展民主结合起来,把加强纪律性作为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的“一个中心环节”,要求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需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并提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以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种在建立新中国的创举中所形成的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精神,是一种体现党、政府、军队与人民群众的新型关系的民主精神。

三是“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

新世界)的科学精神。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在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了最初的基础分析,确定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向,并考察了新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五种经济结构,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进城后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全党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快地学会生产、商业、银行等技术和管理工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郑重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①两个“善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建设新中国”的道路问题进行最初的探索之中,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按着中国的国情搞建设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与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

四是“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继续创业精神。在西柏坡,执政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共产党人会不会变成李自成?能不能经受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这关系到革命的成果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能否走下去?在解决这个重要课题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执政党建设,提出“两

个务必”,“就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政治保证”^③。这里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以功臣自居,不受权力腐蚀,不被糖弹击中,勤政廉政,艰苦奋斗的继续创业精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柏坡精神产生和形成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它是一种体现中国革命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要求的革命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的本质是抓住转折的机遇,继往开来,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的探索精神,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敢于”的革命进取精神、两个“坚持”的民主精神、两个“善于”的科学精神、两个“务必”的继续创业精神。对于西柏坡精神科学含义的正确了解,是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西柏坡精神的基础和起点。

第二节 西柏坡精神的思想渊源

西柏坡精神形成于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它的产生不仅适应着时代的需要,不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且还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

一、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西柏坡精神的产生,与马列主义建党学说有着最为直接的传承关系。

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没有一个先进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阶级性和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立论之基。第一,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曾经在 1959 年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9 页。

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1439 页。

③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它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第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以后他们又进一步预言了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从那时起,共产主义理想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神圣目标和精神动力。第三,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纪律。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党的组织原则。在建党的实践中,他们又提出党内一律平等,实行选举,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等具体原则。同时还指出,党内要有统一的领导,要有权威,为了维护党的统一领导,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等。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并联系当时俄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的建党思想。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党执政以后,脱离群众的危险会增大,因此,一定要在执政以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的特色。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发展创造,赋予它许多中国特色。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极端落后,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特别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转到了农村,在农村的环境中建党,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很大比重。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如何建设一个革命的政党,怎样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

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概括地讲,其主要特色表现在:第一,党的建设必须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行动总方针,决定着党的建设。第二,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要不断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三,把党风建设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认为党风问题即党性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优良作风。第四,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过程,形成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这就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要形成集中统一,维护各级组织特别是中央的权威,以有效地实施党的领导。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

西柏坡精神是与共产党的建党学说一脉相承的。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使得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大多数,这无疑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要想保证党的性质,要想使党的纲领能够顺利实现,就必须从思想上、作风上从严治党。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面执政地位,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革命精神。它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角度,捍卫、发展了马列主

^①《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0页。

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与中国共产党本身特点相结合,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结合,适应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进一步中国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与光大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己任。因此,她自然就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并将其发扬光大。

中国历代优秀思想文化的丰富源泉。中华五千年中的历代思想家都把谦虚谨慎、奋发图强作为努力阐发和重视的一种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早在中国西周时代,《尚书·大禹谟》就提出了“满招损,谦受益”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思想,这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修身处世的金石良言。孔子是中国第一位建构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的思想家,他以“仁”为核心,以“智、仁、勇、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等要领为框架,形成了完备的道德修养学说。在他的思想中,处处体现着奋发向上和谦谨有礼的君子风范。他说:“刚、毅、木、讷近仁。”既强调要具备刚强、坚毅的品格,又强调要讲话慎重,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孔子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成为世人的楷模。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论原则,他提出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要杜绝主观臆测、绝对肯定、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毛病,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些思想,提出要养浩然正气,培养富贵不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坚定品格。先秦之后的思想家对上述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深化与完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

亡身”“公以生其明,俭以养其廉”等名言格句成为世人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特别是近代思想家,如顾炎武、魏源、龚自珍、谭嗣同等,自觉地将个体的道德修养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起来,不懈地探索着中华民族的自强之路。在他们的所作所为中,更为突出地体现着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和高尚品格。

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奋斗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以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中华民族为了反抗压迫、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1939 年指出的那样:“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特别是发生在 300 年前的李自成农民起义,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革命队伍,都经过了艰苦的长期奋争。但是,李自成的起义军在取得政权后,腐化堕落,忘记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很快就导致了政权的灭亡。1944 年,毛泽东同志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的整风文件,希望全党引起高度重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样将取得全国政权。历史的教训、民族的奋斗,为西柏坡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源泉。

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的深厚积淀。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精神不仅存在于我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之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2 页。

中,而且鲜活地体现在中华民族历代劳动人民和杰出人物的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中。综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古代社会,自然灾害和战乱频仍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但正是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谦虚的品格。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将这种思想用格言、谚语、民间故事等形式总结出来,将其作为修身和持家的法宝,通过言传身教使之传诸后辈。在这长期的历史传承过程中,艰苦奋斗和勤俭谦虚的精神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人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杰出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事迹也成为优秀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舍生忘死、奋勇抗敌的岳飞、文天祥,尊师敬长的孔融、张良等民族优秀人物都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这些埋头苦干、为民请命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西柏坡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发扬和光大。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同时,西柏坡精神之所以产生,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透彻了解和传统文化知识的深厚学养,这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思想素材;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正确运用,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进行审视、分析民族遗产,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升华;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上溯中国历史,历代不乏开创伟业的君主帝王,但他们屡屡从艰苦创业、励精图治,走上贪图安逸、腐败衰亡。正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思,中国共产党人才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关头,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精神是对优秀民族精神继承和总结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柏坡精神将传统美德从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中剥离出来,摈弃了其中为封建王朝、为封建社会秩序服务以及其中狭隘的小农意识等历史的局限,将其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共产党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党的宗旨的生动体现。第二,使其超越了古代社会个体人格修养的狭隘范畴,从关乎革命成败、国家兴亡、执政党能否得到人民拥护的高度提出来,使其成为凝聚全党继续前进的有力思想武器。可以说,西柏坡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本色,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和发展。

三、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的政党。在长期艰苦、曲折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锻炼、培养并形成了自己的革命风格和优良作风,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巨大推动力量。西柏坡精神就是对这些革命风格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展。

西柏坡精神源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时就表现出的革命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党的一大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都表现出了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虽然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力量异常强大和蒋介石的背叛,大革命失败了,但是处于白色恐怖包围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为了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我们党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进行英勇顽强的反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西柏坡精神源于井冈山精神。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城市走向农村，领导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不仅创建了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民军队，而且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根据地，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生活非常艰苦，红军靠“红米饭、南瓜汤”和野菜充饥，靠自己种棉织布做衣，靠采草药治疗伤病，靠自己造枪炮打击敌人。就是靠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一次次“围剿”，扩大了红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江泽民同志视察江西革命根据地时说，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燃遍全国，走向胜利，就在于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

西柏坡精神源于长征精神。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和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受到了排斥

和打击，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长征中，虽然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但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②正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己内部的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使我党我军实现了由失败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正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从实际出发，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是我们党战胜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才使红军始终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总之，长征的胜利，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给了全党全军以坚定的信心和巨大的勇气，靠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和不怕死、不怕苦的革命精神，靠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一句话，靠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

西柏坡精神源于延安精神。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达延安后，我们党正确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民族利益为重，首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为了抗战，西安事变后，我们党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为了抗战，在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甚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时，我们党仍然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

①《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②《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